

圆桌谈

主持人：

马兵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嘉宾：

金春平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李知展

《牡丹》杂志主编

张悦

山东财经大学教师

文学批评，于「热闹」间何去何从

当社交媒体降低了评论门槛，碎片化的情绪表达、流量导向的夸张吐槽往往盖过了扎实的文本解读。很多时候，读者分不清到底哪些是凑热闹的闲谈，哪些又是真正能帮人读懂作品的批评。往往就会有这样的困惑：文学批评的“门道”和“热闹”哪个更重要？

其实，“门道”和“热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既能扎根文本、带着真诚的审美判断力，又能跳出象牙塔，打通创作者、作品和读者的文学批评。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形成真正的互动，文学才能走到更多人的心里。

——主持人



创作、评论，共创美好

□李知展

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应该是同代共生、共同成长、温情守望的。特别是好的评论家，因其阅读的宽广，可以跳脱出写作者当局者迷、对自己笔下文字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敝帚自珍；更因其恳切、体恤、可信服的评价，具有业界广泛的声音和影响，有助于作家苦心孤诣的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

这些年，我一直在基层文学现场，以编刊物、做文学文艺活动为生，经常召集评论家、刊物编辑面对面，给基层作者作讲座、改稿，不免要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我总是小心翼翼，努力从作品里发现一点闪光。因为我深知基层作者不易，他们是文学的地基。现在我服务的文学刊物《牡丹》杂志，每一期都会留出充足的版面，给这样打动人心、带着生命情感和滚烫温度的基层作家、本土作家作品以展示的舞台。

理想的文学生态，要有树，有草，有苗。树在茁壮，草在开花，苗在萌发。年轻的文学人才，渴望有一些平台来浇水灌溉、托举期待。如此，他们将来也会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文学批评，我想，不仅要“耳光响亮”，更应该是针对文本的分析，去去虫子、扶扶树干、清静侧枝、调整风向、匀点阳光，目的是让树苗健康成长。

我还想再说说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实题材为主要写作资源的青年作者，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困惑。恐怕这也是评论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写作道路呢？写作自然是自由的，也正因此，我们才从各个来路汇聚到写作这条船上。我非常尊重比如梦境、幻想、历史、文本探索和试验等类型作品，因为写作的自由，才构成了如此斑斓的文学星空。有些青年作家并未刻意直接书

写当下的时代命题，但他们的作品里也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琐碎和印记。这是无意识的，也是身不由己的。另外一些青年作家，则是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去直面时代的问题，深入生活，扎根特定行业、人群，关注更广大的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截取一段水域，以作品来反映时代的磅礴、复杂、深刻。我觉得这两种作家是并行不悖的。第一种作家扎根文本艺术里，可能提升了艺术的高度；第二种作家则沉重、郑重、郑重地强攻时代问题，思考时代中人的命运，可能拓宽了作品的意义。当然，我敬重第二种试图在激流中搏击、贴近时代脉搏的作家，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作家而付出努力。在现阶段，我个人的写作主动选择和社会现实贴得更近，试图去处理当下发生的一些现实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作为写作者还是具体的人，分分秒秒都活在时代的裹挟和成全中。

第二个困惑是青年作家、写作者主体本身，如何守住写作的初心。众所周知，青年作家往往才华和野心未能相匹配。常常是在瞬息的感觉爆棚之后，陷入巨大的怀疑、持续不断的焦虑、时时刻刻的困惑、咬噬人心的纷繁欲念。说实话，选择了写作这个行当，很难再有真正的放松和宁静，内心里总是绷着一根弦，人物、细节、结构轮番在脑海中上演。常常被内心的不甘和现实的处境折磨得难以成眠：写得顺畅，怀疑自己；写不下去，更怀疑自己。

我承认，这似乎已经背离了写作的初心。而写作和评论，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初心。我想，这初心就是，我们需要读者，需要对话，需要传播。我们需要通过言说和文本来描述、思考、干预、改变这个世界，努力留下一些关于爱、关于美好、关于创造的声音。

在AI时代，如何体现批评“有门槛”的公共性

□张悦

多少今天学术界流行的术语，但它们敏锐、锋利、充满洞见，而且都带着说话人的体温。

这种批评传统在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学院派嫌它不够“专业”，自媒体嫌它不够“有料”。但我觉得，AI时代可能会让它复活。因为当技术把低端的工作都做了，批评者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真正重要的事：去谈，去感受，去想，然后用干净清楚的话说出来。它可以在“门道”与“热闹”的辩证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感性的真实性”与“逻辑的自洽性”。

所谓“感性的真实性”，指的是批评必须发自阅读的真实体验，而不是为了套用某种理论而强行解读。太多学院派批评的问题是“先有框架，后有文本”——拿到一篇作品，首先想到的不是“我感受到了什么”，而是“我能用什么理论”。这种本末倒置的操作，产出的文章看似专业，实则空洞。相比之下，一个普通读者哪怕语言粗糙、缺乏术语，但只要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其批评的“真实性”反而可能更高。

而“逻辑的自洽性”，则是对“感性的真实性”的必要约束。批评需要为自己的感受提供理由，需要建立起感受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因果链条。这种“理由的给出”不必然需要学术术语，但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法则：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无中生有，不能以偏概全。

“感性的真实性”与“逻辑的自洽性”的结合，正是区分“批评”与“随口一说”的关键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豆瓣网友的千字长评，可能比一篇期刊论文更有批评价值：如果前者做到了“感性的真实性”与“逻辑的自洽性”，而后者仅仅是理论的生搬硬套。有人会说，这不是降低了批评的门槛吗？对啊，

以己度人，写作者面对评论家的心理大都比较矛盾：一方面渴望评论家关注、评论、推介自己的作品，听到鼓励、褒扬的话自然是美滋滋的；另一方面，一旦评论家的“手术刀”当真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的头上时，又会阴暗地觉得，他们真的读懂了作品吗？或许不过是以词汇加高门槛，倚在栏杆后面自说自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到了自媒体时代，谁都可以一吐胸怀，评价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随意、情绪化、片段式、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爱则欲其生，恨则一钉耙打死，很多时候已没有是非标准，只剩戾气攻伐。

近期看姚雪垠先生的一些资料，了解到茅盾先生在《李自成》写作期间给予姚雪垠的指导、评点、建议。姚雪垠先生感慨道：“在文化界，我的前辈和同辈中的专家学者中因为读了《李自成》而被认为是知音的人有许多，其中有叶圣陶、吴晗、曹禺、胡绳、夏衍、秦牧等等，留待在我的回忆录中叙述。但是都不像茅盾先生在晚年身体与视力都很弱的情况下，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仔细阅读《李自成》前两卷，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我深为感动和感激……他的意见往往解决了我的犹豫，使我做出了决断，越过了写作中一个又一个障碍和关卡；有时又在《李自成》之外，我同他泛论古今，谈到不少其他文学艺术问题，也使我获益很多。可以说，茅盾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多的前辈作家，而且从青年到晚年，持续数十年，不愧是我的知音和恩师。”

前辈风范，读之，令人动容。再联想到鲁迅先生，不觉得其他当时仍处青年时期、后来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家的指点、推荐，仅说对生于河南省鲁山县的诗人徐玉诺、生于河南省卢氏县的翻译家曹清华的评论、推荐、帮助，便让人无比感动。

豆瓣短评、小红书笔记、抖音视频、朋友圈随手一发的读后感，每一条都在生产着关于文学的判断。当一部新小说上市，热搜话题可能比学术期刊的论文更能决定它的命运。更麻烦的是，AI来了。打开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输入“请用后殖民理论分析某本小说”，几十秒后它就能生成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且术语准确，结构完整，引证也像模像样。那些需要研究生苦读数年才能熟练掌握的理论话语，现在变成了唾手可得的公共资源。这对学院派批评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诸如理论运用和搬运术语的能力被机器轻易取代，那么他们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这种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也可能是一次机会。当技术接管了那些重复性的、可算法化的分析工作，批评者就被迫回到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文学批评到底是在干什么的？

答案或许不在于技术不能做什么，而在于人应该做什么。AI时代的文学批评，其专业性不应再体现在技术性的理论操演上，而应回归到无法被算法复制的人类经验、情感智慧和价值判断上。好的文学批评，应该从经验出发。不是先去翻理论工具箱，而是先问自己：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哪里让我停下来？哪里让我感到不舒服？哪里让我大笑或者流泪？然后再追问：这些反应从何而来？是情节的设置，是语言的选择，还是人物关系的张力？这个过程不需要炫技，不需要术语，但它需要两样东西：感受的诚实和推论的严谨。这其实就是文学批评最古老的传统。想一想那些我们至今还在读的批评文字——约翰·厄斯特的《诗人传》、伍尔夫的《普通读者》、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刘西渭的《咀华集》。这些文字没有在用

在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谱系和文体形态的隐秘变革进程中，时代历史话语往往充当着文学批评革新、演进、形塑的最大公约数。从政治、社会到人文，从世界、地区到本土，从国家、历史到民族等，文学批评始终保持与多元而流动的时代历史话语的精神应和。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文学批评也持续调试着自身的社会历史位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变革，更多活跃于批评范畴的“内部增殖”。从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审美资源、方法资源的借鉴或转换，到批评家的个体经验、语言风格、文法修辞等的发现或融合，文学批评逐步构建出兼具本土性、时代性和当代性的话语形态。

新大众文艺，作为当前宏大的文化景观、强劲的历史感召和公共的时代话语，指涉着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当然也包含了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的本身革新、对话开放、共识建构，是将文学批评的意义生产与大众精神的价值引领实现深层关联的重要方式。

在我看来，第一，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学批评应具有文体革新的持续实践。尽管精英化的文学批评很长时间以来遭受着大众观感的诟病：语言晦涩、行文枯燥、概念生僻、阐释无力、文辞僵化等，但这并非专业文学批评的“典范”或“标配”，而是文学批评的部分“症候”。

真正的专业文学批评，既需要批评家能娴熟地调动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深刻的思辨，也需要批评家自身的审美感悟、直觉发现、精妙表达，是一种个体的才情、黏帖的知识和公共的理性的有效结合。它既要对本体所隐含的价值意蕴进行开掘，也要对本体所关联的价值可能进行推导或生产，从历时的文学经典、公认的文学理论、共识的文学史学等纵横坐标视阈，考察文学的突破与创造、偏狭与史学。

不过，专业的文学批评，似乎对当下的现实性和读者的情感性展示出谨慎而犹疑的姿态。因此，新大众文艺时代，专业文学批评应该树立“现场意识”和“读者意识”。所谓“现场意识”，不仅要对当下的文学进行及时介入，而且应该从社会之现场、人民之现场、文化之现场出发，展开文学的分析、阐释和判断。当然这里的“现场意识”必然包括文学的历史经验，但更需要批评家具有对现场生活世界的总体审视与认知能力。而“读者意识”则吁求专业文学批评从批评文体、批评文风、批评逻辑、批评语言、批评姿态等方面，重新确立“读者意识”的内涵。譬如将读得懂、看得明、解得透、说得准、剖得深等，作为专业文学批评被读者大众所接受的前提。专业文学批评也可以借助快评、跟贴、转发、留言、弹幕、访谈、自白、点读、读书分享、媒体评论等，实现批评的同步性、互动性、现场性。

第二，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学批评应具有开放对话的积极行动。专业文学批评实践往往生成于“批评家—文学文本—意义生产”的序列当中。因此，批评家的个体经验的宽度、广度和深度，往往决定了批评的切入路径和发现深度，甚至形塑着批评文本的文体样态。同时，携带着不同经验方法的批评家个体，对同一文本的批评阐释也会大相径庭。而由于个体经验的多样性，其批评路径甚至会呈现出某种特征化或风格化。这既是一个批评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批评家定型的表征。

面对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等领域斑斓多变、精彩纷呈的文学现象，叠加知识获取便捷、人工智能普及、读者期待高涨等情境，批评家必须持续拓展个人经验的主动与自觉。这种拓展、开放、对话，包含了至少三个维度——介入人民、回归生活、触摸情感。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能走出书斋，重启文学批评对人与文学之间的情感生成、情感理性、情感反思的功能引领。

第三，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学批评应具有共识构建的价值自觉。当人工智能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论，当大众读者可以对文学文本进行美学解读，专业的文学批评也面临新的挑战。文学批评不仅需要具备深广的文学经典、文学理论、文学史视阈，还需要将个体放置于社会历史演变、日常生活肌理、大众精神情感等维度，从而构建个体经验、文学经验、现实经验彼此应和的批评思想、批评方法、批评美学。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在技术迭代迅猛的时代，需要更加笃定的人文主义精神，坚守永恒人性和人类良知。要锚定审美主义精神，发现文学美学和艺术精妙；秉持历史主义精神，践行历史辩证的思想方式；持守知识分子批判精神，批判人文症候与文化乱象。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在深入文学现场的同时，更需要具有远观审视现场的理性，在“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双向视阈当中，涤荡文学话语的喧嚣，剖解文学蕴藉的奥义，将文学放置于社会历史、大众生活、文化结构当中，持续生成由“技”到“道”的“公众共识价值”，以此抵抗技术盛行、消费蔓延、生活倦怠所引出的人文精神的诸多困厄——我想，这是文学批评重建话语尊严的革新要求，也是文学批评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重要方式。